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专访录——

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消息报社 编



Interview series:
Nobel laureates on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s

中国计划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专访录——

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经济信息报社 编

interview series :
Nobel laureates on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s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北京

(京)新登字 0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消息报社编。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1

ISBN 7-80058-377-5

I. 诺… II. 经… III. ①经济-研究-中国②现代资产阶级
经济学-研究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5897 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

——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

经济学消息报社 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月坛北小街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 印张 116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13000 册

☆

ISBN 7-80058-377-5/F·234

定价：8.50 元

前 言

1994年6月，在我刚刚采访完美国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国后，有朋友就给我建议，赶紧找家出版社，把这次采访结果出书。报纸工作紧张，我当时只随意说了句：“我们还是埋头做自己的报纸，有心人，你不找他，他也找你”。

同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中国计划出版社的利广安先生打来长途电话，希望报社能授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结果供该社出版。我乐了，一口答应了。后来又有两家出版社联系此事，我说本报已获知音。

从1994年5月4日开始，由我报社组织的“诺贝尔大追寻”行动在美国西部、中部、东部展开。在这次行动中，本报独家采访了几乎所有健在的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这在我国新闻界和经济学界还没有先例。

这次活动采取的是署名提问方式，我国经济学界有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报发起的“诺贝尔大追寻”活动。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十分关注本报这次采访行动，吴敬琏、刘国光等致函致电预祝采访成功。

本报记者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各地会员悉心帮助下，从旧金山起，辗转圣迭亚哥、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匹茨堡、华盛顿，从西到东逐一叩问了12位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报这次活动于当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诺奖得主布坎南的书房里划上了圆圆的句号。

这些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十分友好、兴味十足地接受了本报的采访。萨缪尔森教授在采访完后还将一篇新写就的稿子交给我，并幽默地说：“我是很贵的。但这次对贵报免费。”当我邀他经常写稿时，他说：“我会的，我写文章像喝酒，随时都会酒瘾大发。”莫迪利阿尼教授十分健谈、风趣，他对我说：“如果你们早来20年就好了，我会更幽默。”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教授，因日程安排已定下去欧洲访问，故与我们的采访时间冲突。他还特意嘱咐有关人员让本报把问题留下，他一定认真答复。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的一张经济评论周报，这次采访是为读者所做的一次成功服务。为使这次采访内容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研究，应中国计划出版社要求，我们将这次活动中的专访与综合报导一并奉献给广大读者。虽然不能说这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所有意见都正好讲到中国问题的点子上，也并非我们全都同意，但他们确实都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有许多看法对研究中国问题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此次活动离不开国内和海外众多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采访内容的发表，也离不开本报编辑柳森、张伦忠、李吉明、周晓明的精心编辑制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张承耀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事宜做了很多工作，借本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深深感谢中国计划出版社对这次采访内容的垂注和及时出版。

《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

高小勇

1994年12月

基础理论与具体应用

——“大追寻”后的反思（代序）

樊 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在这假冒伪劣泛滥、人人都想称自己是“世界之最”的日子里，《经济学消息报》的“诺贝尔大追寻”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首创”：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报纸，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不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而是表现出我们 90 年代的中国人对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大追求”！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特点是：它不是授予成功地应用经济理论并制定出某种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而是授给在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作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而促进了经济学在各领域内成功应用的“理论经济学家”。这次采访的 12 名经济学家都属于这一族（萨缪尔森曾拒绝了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任职的邀请）。当然，在这 12 位之外，其他诺贝尔奖得主有的曾出任政府顾问，如托宾，但他获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在基础理论上的贡献。

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别。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为理性”的理论，关于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相

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理论，关于各利益集团相互冲突与公共选择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都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們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就无须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追寻”，最主要的就是追寻他们各自为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所做的特殊贡献。

有条件、有“国界”、有利益差别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首先，就经济学的一般内容而言，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分析中就相当于不同的“限制条件”，在这些不同的限制条件下所得出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结论”，自然也就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比如不同的“平等”观，不同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也会导致经济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具有不同的偏好目标，人们想要“最大化”那个一般性目标函数即所谓的“幸福”（“效用函数”），具有不同的内容，决定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再者，社会是分成利益集团的（有的情况可称为“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他们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与其他一些科学也没有什么差别，比如人们既可以利用物理学原理造核电站服务于

人类，也可以用同一些基础理论来造原子弹杀害人类。当然，这并不否定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布坎南语），但即便如此，经济学家自己要先明确，社会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经济制度改进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冲突各方的利益更好地加以协调，防止因一方利益受到过多损害而导致激励不足或社会动荡，使经济效率得以改进，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

真正的“大家”，不会忽视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具体问题时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从这次“大追寻”的各篇访谈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谈出自己观点的同时，都强调了具体条件的重要性，许多人都谦虚而客观地提到自己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所提意见不一定中肯。与此同时，作为追求真理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们也强调了一般性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从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出发，阐发与强调了某一方面的经济规律。我想“大追寻”各篇谈话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其实不在于各诺贝尔奖得主们提出的那些具体的“对策性”观点，而正在于他们所阐发的那些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在于他们将这些基础理论与具体条件相联系时所采用的那种思维方法。

这也让人联想到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

容与方法；而那些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某些国家、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某种特定文化背景而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作法，才是真正不必给予过多强调的。如果我们掌握了基本理论与方法，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具体条件肯定比“外人”（包括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们）更熟悉得多，就可以自己来“应用”，得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最优的”具体结论，包括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体制度安排、具体政策手段、具体发展战略。而如果我们只去学那些“皮毛”的东西而没有学基础理论，那一定会经常发生这些年人们总在指责的“照搬西方”或“下错药”的问题，而且只能老去请别人来“当顾问”，自己总也拿不出高明的办法（当然这不否认今后我们还是会不断请人家来当顾问）。

“大追寻”不是“追星族”的“发烧”，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科学，使我们能在经济学这一重要、甚至是最重要（“自吹”？）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也逐步“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因此，我想我们不应仅仅从“大追寻”的丰硕成果中看看“热闹”，而是要更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想一想如何才能明确方向，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最后，让我们这些坐在家中坐享“大追寻”其成的经济学工作者，向发起、筹划、组织并实践了这次“创举”的《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及其他人士，向帮助完成此次行动的留美经济学学会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94年12月10日于北京方庄

目 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企改·····	(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通胀·····	(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金融改革·····	(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人口问题·····	(24)
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 诺奖得主辨个中殊异·····	(28)
诺奖得主谈 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 ·····	(34)
诺奖得主谈法制与经济发展·····	(46)
克莱因：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	(51)
贝克尔：中国收入差距仍太小·····	(54)
诺奖两得主评说信息高速公路·····	(56)
福格尔访谈录·····	(59)
米勒访谈录·····	(66)
莫迪利阿尼访谈录·····	(70)
萨缪尔森访谈录·····	(78)
克莱因访谈录·····	(86)
西蒙访谈录（之一）·····	(94)
“组织问题与建立市场经济同样重要” （西蒙访谈录之二）·····	(98)
“政府重心应放在整体框架结构上”（布坎南访谈录）·····	(105)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纵横谈（之一）·····	(115)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纵横谈（之二）·····	(120)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纵横谈（之三）	(124)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纵横谈（之四）	(134)
附录：	
从米勒建议我国修路说起	(138)
诺奖·制度转变·对策论	(14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谈企改

记者：高小勇

米勒：大体上，股票市场是可为企业提供某种刺激的。但我认为你们的国有企业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它们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它很多单位，很难把工厂和非工厂的部分区分开来。如果只是工厂的话，事情就简单得多。可以把它股份化。但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比方真正是工厂的那部分里有4万工人，但整个工厂却有40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不仅经营工厂，还有邮电和其它事业。我想中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工厂和商业分开，将工厂与政府机构分开，它们自己筹措资金。这一点在中国还未做到。你们首先应把企业与其它事业脱离，然后你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你必须想办法安置

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那将很不容易。也许你们可以设立时间上的目标，比方每一年让5%的工厂，包括那些商业企业实行股份化，在20年内全部完成。同时，你们也可建立大量新的企业，但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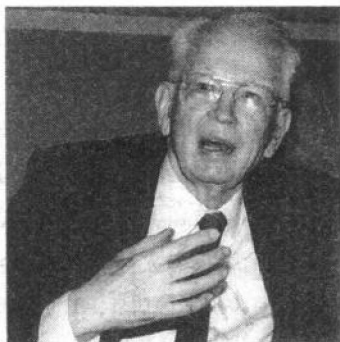
你们怎样安排那些人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你关闭工厂，而工厂实际上是个城镇，比如武汉，怎样处理那些老工业呢？是的，关闭它们吧！作为经济学家通常非常希望那样做。但那意味着那些工人将失去收入，他们能去哪儿呢？这相当困难。你只能宣布：“我们将要关闭这间工厂，我们将按下述办法安置工人……”然后把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新设立的企业里。在美国，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只需说：“这间企业必须关闭了。”但这是两码事，需要耐心。比如你们修长城用了很长时间，不可能一夜建成。但是你得说我们希望摆脱，让运行良好的企业继续经营下去，其余的每年关闭其中的某一个百分比，而不是一年之内全部关闭，不然将导致一场社会灾难。每年有规律地关闭5%的亏损企业，让人们知道有3年或更长的时间作调整的准备，让他们最好尽早地计划未来。但要受到一个时间表的约束，不要简单地说：我们将在某一时间完成。可以说每年完成5%的企业股份化，20年内完成。在那些企业还没有股票上市的情况下，你怎么估计企业的价值呢？可以进行拍卖，只要有许多人来竞价就行。这是另一种市场。

在中国，有许多企业，他们甚至开办学校。在美国这个国家，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我们把它们叫做“公司城”，它们过去通常在边远山区，如开发煤矿等。没有文化设施，于是煤矿公司自己开办学校等。但非常少见。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将政府的职能从企业中分离出来，包括学校、医院等。当然可以让学校、医院也股份化。于是，钢铁厂就只生产钢铁，不开学校、餐厅、旅馆。关

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你们不应只看美国模式或是日本模式，还可以看看智利，它们建立的是私人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体系里，人们的储蓄被用于国民经济中再投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你们想要的，那不是保险，只是在你离开的时候偿还给你。这一代人付钱供养晚年退休人员。从根本上来说，这里面没有储蓄的成分。事实上可能我们有负储蓄。你们不要模仿。我经常这么说，你们刚刚起步，要环顾世界，寻找合适的模式，不要总以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它可能不是。还有许多其它的。在决定采用哪一种之前，多看一些。

科斯：我不知道。我想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我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更好。有许多方式已在许多国家试验过了。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实际上，我不能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各国都适用。因此，我根本难以提出什么建议，除非你们全在一个国家（笑）。

许多中国人担心外国资本购买中国企业，我并不认为这类担心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我想，排斥外国人现象在所有国家均司空见惯。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是，所有权普遍被掩盖住了。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企业就像美国人的企业，没有人知道它实际上是一家外国企业。例如，你们知道芝加哥的 MARSHALL FIELD 商场刚刚被收购，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大企业收购的，但 MARSHALL FIELD 被收购之前是谁拥有的呢？是英国人的。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商场是英国的，也



罗纳德·哈里·科斯
(Ronald Harry Coase),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
芝加哥大学教授

没有人不在乎是谁的。这种现象在这里常见，在英国也常见，也有很多美国公司在英国经营。有时人们知道一些公司是外国人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但某些工程公司你就不知道是归谁所有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这无关紧要。不管这个企业是英国、法国或还是美国人经营的公司，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一样，都想赚钱。最近一家法国公司（座落在芝加哥广场附近）被收购，我想这是一家大型法国电器公司，过去与这家公司做买卖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家法国公司），为什么又要知道呢？所以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管理选择，增加竞争。如果你说企业经理人员只能是阿尔巴尼亚人，这就很受限制。我知道，中国有许多伟人，中国人很有才干，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不是更好！不同国家的人甚至会把中国的企业经营得比中国人经营的更好。问题是要弄清楚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为什么交易成本在中国会这样高？贸易障碍太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海外华人生活水平会比他们过去在中国时高得多？他们在许多国家从事活动，但如同我们所见到的，他们不是到发达国家，而到欠发达国家。他们在那里生活水平比当地人还要高，也比在中国时高。比如在马来西亚，那里的中国群体非常成功。他们遇到了对外国人的敌视，他们有的转移到新加坡。但即使仍在马来西亚，他们也极其成功。

马克维茨：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在印度，据说如果你想办私人企业，你要贿赂很多的人士才能办得到。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曾去过那里。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在俄国，据报道政府还在补贴大型的国营企业，即便它们变得越来越低效率。我想他们应逐步撤销补贴，但又不可太快，以免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做得



哈里·马克维茨 (Harry Markowitz),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切学院教授, 现为 Arbitrage Management Co. 总裁

比较漂亮, 它成功地吸引了外资, 在南方优先发展经济, 同时又不致于引起全局的太大震动。我想中国目前当务之急是扩大私营领域, 缩小政府的补贴。显然, 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的, 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

对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如何限制, 是个复杂问题。当然会有这样的情形, 因政治原因而设立一些限制。有的时候, 相对较小的公司也可以与大公司竞争, 只要不受到某种限制。它们甚至可以做得非常成功。在美国, 其中最大的一个受政府补贴的企业是邮局。在过去, 政府曾极力保护这一垄断企业, 不允许其他人参与投递信件。

现在有了某些放松, 如 UPS 可以在快递方面加入竞争, 它一下子就做得非常成功。所以, 只要政府取消了垄断企业的某些不公平优势, 允许小企业进入竞争, 就可以搞活经济。当然我同意你刚才的观点, 对外国资本的进入作某种限制, 如电讯部门等等行业, 以便自我保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谈通胀

记者：高小勇

记者：上海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上海理工大学的宋承先教授、上海华东师大的陈彪如教授、西南财大的曾康霖教授、国家计委的黄范章教授、建设银行总行的陈彩虹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先生、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邱晓华等都有问题想与您交流，但时间太有限，只好合成一个简单问题：您对目前中国经济高通胀、高增长的状况有何评论？

萨缪尔森：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认为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因为，长期地看，奔腾式的通胀对于持续的实物增长是绝无好处的。并且通常这很危险，因为如果发生奔腾式的通胀，这将比过度信贷